


6万多名“河长”保护13万公里河流

 新华社 商意盈

“村里的河道就像自己的责任田，一定要想办法治好、管好，这是没得商量的事。”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园周村的周双政除了是村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村里所有河流的“河长”。

周双政是浙江6万多名“河长”中的一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共有省级“河长”6名、市级“河长”199名、县级“河长”2688名、乡镇“河长”16417名、村级“河长”42120名，还配备了河道“警长”、民间“河长”，五级联动的河长制已经形成。

浙江在2013年全面开展“五水共治”，对省域内13万公里长的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河长制是其中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11月底，全省221个省控断面水质Ⅲ类以上占76.9%，比2013年提高了13.1%；劣Ⅴ类水断面占2.7%，减少了9.5%，垃圾河、黑臭河基本消除，城乡环境明显改善。

站在温州市瓯海区瞿溪河畔，只见河水清澈，河边绿叶黄叶缤纷。家住瞿溪河边的张大伯说：“治水之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水的颜色几天一个变，有时候是‘黑河’、有时候是‘牛奶河’，走过河边，大家得捂着鼻子。”

成绩背后是严格的制度保障。浙江先后出台了河长制长效机制、基层“河长”巡河、入河排污口标识等长效管理机制，全省河道每天有人巡有人管，巡后有记录、发现问题有处置，基本做到日查日清、事事有回应。

衢州市龙游县县委书记刘根宏，到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治水”。上任没几天的他已经巡查了县域内的不少河流，还对问题进行了认真记录，并提出了整改意见。

为了狠抓落实，浙江各地把河长制开展情况纳入“五水共治”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并逐级对每位“河长”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问责，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随着河长制的深入开展，浙江已初步实现了全省河长制信息平台、各类APP与微信平台等全覆盖，搭建了融信息查询、“河长”巡河、信访举报、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治水大平台，治水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徐有德是衢州常山县金川街道徐村的一名村级“河长”。每天，他都会带上刚买来的小型航拍机，对辖区内的常山港河进行空中拍摄，发现可疑水域后，用无人机下面挂着的自制取水器取水样送检。

“我管辖的这条河有1200多米长，最宽处有200米，平时步行巡河至少1个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飞个来回。有了这个帮手，真是方便了不少。”徐有德说。

(上接1版)

今年初，杭州市纪委出台制度规定，明确问题线索的范围及报送方式，并统一归口到案件监督管理室集中收集、汇总管理。同时，为了让问题线索及时、准确“对号入座”进行处置，市纪委还建立了“每周由各纪检监察室集体分析，每月由分管副书记和常委参加集体分析，每季由市纪委书记主持集体分析”的三级集体排查和处置问题线索的规范化管理机制，逐人逐件进行研究分析，集体确定处置意见，实现问题线索的动态“清零”。

在此基础上，市纪委创新研发“问题线索管理系统”监管平台，使问题线索从接收到审批流程、办理进度、处置完毕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实时监管之下。

据统计，今年1—10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4463件，同比上升100.9%；已了结2199件，同比上升263.5%。

综合施策 在精准执纪中提升公信力

今年以来，杭州市注重整体把握实践“四种形态”，综合考虑政治生态、性质情节、觉悟态度、整改实效等，针对不同违纪情形采取不同处理措施，推动监督执纪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比如，在个案中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适时运用警示教育、集体诫勉谈话、思想引导等工作。同时，各地各单位加强对执纪审查情况开展经常性、综合性地分析研判，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本地本单位政治生态，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口。

前不久，杭州市纪委驻市卫计委纪检组组织的专题警示教育学习引起了系统内党员干部热议。此后不久，某单位“一把手”李某主动找到了纪检组长王秀清，讲清了违规发放福利问题。

“今年以来，市卫计委系统中主动找纪检组谈话的党员干部有78人次，相比以往大为改观。”王秀清介绍，该纪检组在实践‘四种形态’中运用警示教育、有针对性发放建议函、提醒函、警示函和问题约谈等做法，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了纪律和规矩意识。

“实践‘四种形态’面临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绝不能机械对应、生搬硬套。”杭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擎苍说，要善于正确运用红脸出汗、组织处理、党纪处分等多种方式，从讲政治的高度精准执纪，不枉不纵，才能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纪效果相统一，推动政治生态持续优化。

涉及囚犯纠纷 远程视频开庭

 通讯员 杜鹃 李晴

本报讯 近日，台州椒江法院与省金华监狱通过远程视频，审理了一起涉服刑人员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视频两头，当事双方充分陈述，证据采用实物投影仪进行出示，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庭审过程顺利完成。这是椒江法院首次采用远程视频审理民事案件。

这一措施的实施，得益于省高院和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利用监狱内数字法庭和远程视频室开展远程视频庭审工作的通知》，通知规范了申请远程提审、开庭的程序，明确了各单位的联络人，使远程视频庭审更加高效、便利。

据了解，以往遇到当事人被羁押于外地监狱的民商事案件，法院经办人都要事先与监狱确定好开庭时间，再联系其他当事人赶赴监狱所在地开庭，费时费力。通过远程视频开庭后，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反对邪教 共建平安



毒品是啥？看这里




通讯员 三健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近日，三门健跳派出所民警在横渡镇中心小学举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青少年防毒知识讲座，向学生们介绍毒品有关知识，同时播放影片、发放宣传资料，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毒品的危害。

送达问题最难 涉美纠纷最多

杭州中院发布涉外商事审判白皮书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昨天，杭州市中院编写的《杭州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白皮书(2012—2016)》对外发布，该院同时介绍了2012年以来杭州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特点及案例情况。

杭州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大市，对外商贸活动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不断延伸，相应地，由此引发的涉外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但杭州法院发现，从事对外商贸活动的投资经营者在风险意识、规则意识、证据意识和诚信意识等方面仍有不足，预判、应对、化解风险的能力仍有欠缺。为此，他们编写了白皮书，以妥善处理各类涉外纠纷，引导和规范投资经营行为，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白皮书显示，涉外商事纠纷中合同纠纷最多，占94.03%。自2012年以来，杭州法院审结的涉外商事案件涉及3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涉美国案件68件居于首位，涉意大利、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居于前五位，主要原因可能是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比较多。

杭州中院副院长邵景腾介绍说，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最难的，就是送达难问题。由于护照、港澳通行证或台湾地区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件上均不记载住址信息，国内当事人起诉外方当事人的，常常因无法提供外方当事人的确切住址而影响审判效率。“即使有域外

地址，往域外送达的成功率也仅为44.9%。”

此外，涉外审判还因涉及外国法律或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而导致适用法律困难，外国法的查明存在困难，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后无法提供该外国法，花费大量时间后，仍需转而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国内法。

为了减少涉外商事纠纷，法院也向广大企业提出几点建议。企业在订立合同、保存证据、争议处理等环节均应当予以充分关注。在合同订立环节，双方应识别和选择合同主体，了解对方信誉和履约能力，审查外国企业代表的授权手续，在合同中对权利义务、解除条件、争议解决方式等重要事项予以明确约定。同时，应注意尽量收集域外交易相对方的详细信息，便于在诉讼中与域外当事人取得联系。

在合同履行环节，企业要妥善留取履行过程中形成的证据，以便还原合同履行过程。在履行过程中要及时对对方违约行为行使异议权利，也要及时回复和应对处理对方提出的异议，防止对方主张构成默示认可效力。

在争议处理环节，企业应当积极应对，搜集举证。企业遇到纠纷不宜消极逃避，防止因不应诉、应裁而丧失抗辩机会。